新时期我国推进“在地国际化”的战略意义、挑战及对策探析

房欲飞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 200032）

摘要：全球化进程及国际变局带来的挑战，使得当前我国的国际化人才培养面临着四大矛盾，传统的跨境流动模式已经难以独自承担满足国际化人才需求和保障民族利益的使命，亟须通过“在地国际化”补偿其受益面小、对外依存度高、意识形态风险大、后疫情时代不确定性强等方面的弊端。但当前我国实施“在地国际化”所需的前提条件尚面临一定挑战，主要表现在：理念普及面临价值导向的制约；实践探索缺乏平台和制度支撑；跨文化能力培养尚面临异质文化资源获取的障碍。推进“在地国际化”过程中，我国应当以政策和评估指标引导战略转型，把国际资源导向国际化人才培养本位；搭建宣传与交流平台，推出中国特色的实践指南和范例汇编；创新跨文化能力培养路径，鼓励跨越国界的“虚拟流动”。

关键词：在地国际化；跨境流动；国际化人才

On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FANG Yufei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Academy of Education Sciences,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The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hanges have made China's current international talent development face four major contradictions. The traditional cross-border flow model has been unable to undertake the mission of meeting the needs of international talents and national interests alon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to compensate for its shortcomings in terms of small benefits coverage, high external dependence, high ideological risks, and strong uncertainty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However, the prerequisit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in China are still facing certain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ideas facing the constraints of value orientation, the lack of platform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the obstacles to the acquisition of heterogeneous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cross-cultural capabilitie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we should first guid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with policies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direct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to the international talent development; second, build a publicity and communication platform, and launch a compilation of practice guides and exampl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rd, innovate the cross-cultural capability development path and encourage "virtual mobility"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Key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internationalization abroad; international talent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1]。新冠肺炎疫情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但对国际化人才的强烈需求却是大势所趋，如何培养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国际化人才依然是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试图探讨：这个过程中，“在地国际化”何以变得如此必要和迫切？实践基础如何？又有何推进之策？

一、核心概念和文献回顾

1999年，面对全球化世界对国际化素养日益增加的需求，尼尔森（Nilsson）基于对传统国际化教育模式的反思提出了“在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概念[2]。瓦赫克（Wächter）在“在地国际化”的意见书①中将其定义为“高等院校中发生的除师生海外流动之外的所有与国际事务相关的教育活动”[3]。后来贝伦和琼斯（Beelen & Jones）基于对既有概念的辨析，提出如下被广为引用的新定义：在国内学习环境下有意识地将国际性和跨文化维度整合进面向所有学生的正式和非正式课程的过程[4]。荷兰国际教育组织（The Dutch Organization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Education）将其概括为“学生无须离开本国就能获取国际经验”[5]。

我国2008年引入这一概念后，一些学者结合我国国情进行了新界定，其中张伟、刘宝存的定义尤其被广泛引用：在地国际化是指在高等教育国际治理日趋明显的背景下，高校利用已有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国际学者、留学生、国外教材、跨境项目、多元课程与国际会议等——建设富有本土特色的国际性校园，为全体学生在校内提供接触跨文化与国际性事物的机会，进而实现培养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办学目标[2]。本文便取此义。

奈特（Knight）[6]将“在地国际化”视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两大支流或范畴之一，另一个支流是与跨境学习活动相关的“跨境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broad）②，二者相互依存，共同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一些学者对“在地国际化”与“跨境国际化”的效果进行了比较研究：尼尔森、贝伦和琼斯等认为，跨境流动是最有效的国际化形式，但对于更大多数的学生来说，在地国际化可以带来比学生流动更有效的结果[3,7]。索里亚（Soria）等[8]对“在地国际化”与跨境学习在培养全球胜任力方面的效果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认为“在地国际化”的效果并不逊于跨境学习。唐君[9]比较了本土国际化③与出国留学两种模式在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方面的效果，认为前者在培养目标、模式、方法和成果上都有着天然优势。仲彦鹏[10]结合我国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实践，认为传统上以出国学习为主的模式带来了“教育普惠性与教育机会不充分，跨国教育投入高与教育效果不理想”两大悖论，而“在地国际化”有望解决这些矛盾。

就“在地国际化”的实践而言，学者们普遍认为没有标准模式，教育系统特性和社会文化变量都会影响其形态[11]，但也有一些影响其成功实施的要素被反复强调：（1）全校层面的承诺[12-13]；（2）国际化的课程体系及教学[3,14-16]；（3）教师的关键（中心）作用[3,10,17-18]；（4）促进国际学生与本土学生互动的结构化活动[19]；（5）信息通信技术（ICT）的运用[20-21]。琼斯和瑞芬拉特（Jones & Reiffenrath）[22]认为，“在地国际化”有10个关键特征，包括为所有在校生的专业学习植入全球视野、超越选修课或专修项目的国际课程体系、将国际性和跨文化维度融入正式课程、非正式课程的支持、将多元化作为课堂教学资源、为学生创造与当地社会中的“文化他者”接触的机会、所有教职员工的参与、超越英语课程的全球视角渗透、超越本土校园的虚拟流动、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多元互动与合作等。

近年来我国“在地国际化”的研究文献也日益增多，出现了一些本土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总结。在本土理论探索方面，张骏提出了“一境四同”模式，即打造适宜国际化人才成长的环境，中外学生同堂授课、同卷考试、同室科研、同班活动[18]。唐君提出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三阶段递进模型”，并指出注重学生体验和发挥朋辈效应两种方法最为有效[9]。在本土实践经验总结方面，教育观念转变、课程与培养方案改革、国外课程和原版教材引进、中外学生融合、国际化师资队伍等得到了较多强调。但王璐[23]认为，简单的课程引进很可能造成文化侵袭，应对引进的课程进行本土化改造，培养有根的世界公民。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地国际化”进一步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他们认为，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交流，但不会改变国家之间的人才竞争，学生跨国流动和尖端科技领域留学机会的限制，对我国国际化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有必要积极推进“在地国际化”[4,24-25]。

从已有研究来看，尽管推进“在地国际化”的主张正日益得到我国学者的认同，但是对于我国实施“在地国际化”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实践基础，尚无充分研究。本研究拟作此尝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二、新时期我国推进“在地国际化”的战略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时期，随着具有国际视野与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越来越成为一种战略资源，如何培养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建设所需的国际化人才成为时代赋予高校的重大使命。然而，由于传统培养模式的局限及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当前我国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尚面临如下四个方面的矛盾：

其一，全球化时代对国际化人才的规模需求与我国传统培养模式速率较低之间的矛盾。传统上，以出国留学或境外访学为主的跨国学习是我国培养国际化人才的主要渠道[26]，但这一途径成本高，受益面较小，难以满足全球化时代对国际化人才的大规模需求。国际化人才短缺已造成我国高科技产业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局面，核心关键技术面临受制于人的风险，加快国际化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

其二，西方国家的技术与人才封锁与我国国际化人才培养对外依存度较高之间的矛盾。目前，我国核心关键技术领域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对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定的依存度，每年都有为数众多的学生出国攻读STEM学位。随着国家之间人才竞争的日益激烈和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一些西方国家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试图对我国实行技术和人才封锁[27]。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国更是加强了对我国科学技术人员出国交流的签证限制，致使我国以跨境流动为主要途径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受到一定影响。与此同时，近期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了“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的自主培养”的要求[28]。如何增强国际化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无疑成为高等教育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

其三，境外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风险与保障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社会主义方向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个别国家不愿面对我国国家制度和发展模式的优越性，频频对我国展开意识形态攻击和打压，高校更是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境外势力试图把高校渲染成不同学术和思想交锋的自由圣地，进而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保证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社会主义方向，增强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培养国际化人才难以回避的课题。

其四，后疫情时代跨境学习机会的不确定性与我国家庭对国际化教育强烈需求之间的矛盾。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际形势出现诸多不确定性，加之当前的主要留学目的地国家疫情控制不力，许多家庭在子女出国留学选择方面更加审慎，对“不出国门的留学”需求有望进一步加大。这也为我国通过国际化教育“在地”培养优秀人才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

上述四种矛盾的交织，使得传统的跨境流动模式已经难以独自承担满足国际化人才需求和保障民族利益的使命，通过整合本土国际资源实施“在地国际化”教育，有望补偿传统跨境流动模式受益面小、对外依存度高、意识形态风险大、后疫情时代不确定性强等方面的弊端。这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势在必行。

值得一提的是，加强“在地国际化”并非要否定和排斥跨境流动，而是要与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后者依然是值得鼓励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且可为“在地国际化”提供更丰富的国际资源，“在地国际化”则可在扩大受益面、增强自主培养能力、厚植家国情怀和本土文化根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国际化教育需求方面提供保障和支撑。

三、我国推进“在地国际化”的实践基础及挑战

梅斯腾豪瑟（Mestenhauser）[29]在谈及“在地国际化”的本质时曾指出，“在地国际化”并非专门学习项目，而是整合性和系统性的国际教育理念和实践。即，“在地国际化”无须另起炉灶设立项目，只需在一定教育理念指引下，对现有国际资源进行系统的整合利用即可。这一论断表明，“在地国际化”的成功实施，需要三大前提条件：其一，相关的理念准备；其二，进行相应改革创新的能力；其三，可利用的资源。以此观之，当前我国实施“在地国际化”尚面临一定的挑战。

（一）“在地国际化”的理念普及面临价值导向的制约

所谓价值导向，指社会或群体、个人将某种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基本价值倾向确定为主导的追求方向[30]。价值导向是实践者的行为遵循，决定着实践活动的基本走向。根据奈特对高等教育国际化两大范畴的划分，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跨境国际化”尚是主流的价值导向，“在地国际化”则相对被忽视。主要表现在：

从中央到省市的相关政策和发展战略中，“对外开放”都是主流的关键词，如《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2020）、某省（市）教育对外开放“十三五”规划，以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确定的十大战略任务中，国际化领域的表

述也是“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

在院校的发展规划层面，近日笔者对A市53所院校发展规划文本中关于国际化的相关表述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53个样本院校中，49个提到国际化相关战略，在具体表述中，“国际合作与交流”成为主流关键词，占比73.47%（详见表1）。

表1 A市样本院校中对国际化相关战略的表述用语一览

关键词	频次	频率	代表性提法
开放办学	3	6.12%	开放合作办学；对外开放与交流；教育对外开放
国际化	10	20.41%	教育国际化；国际化教育；国际化办学；国际化发展
国际交流与合作	36	73.47%	国际合作交流；对外交流合作；国际交流；国际合作
在地国际化	2	4.08%	在地国际化；全校国际化
合计	51	104.08%	

注：1.关键词来源于总规划文本关于国际化战略的表述或专项规划题名；2.由于“全校国际化”有面向全校学生的指向，符合“在地国际化”的精神实质，故作为“在地国际化”来统计；3.之所以频次大于49，频率之和大于100%，是因为有两所院校在国际化相关战略规划中提到了拟同时探索“在地国际化”（全校国际化）。

由此可见，从中央到省市再到院校的各个层面，国际化相关的政策和战略对“跨境国际化”的偏重都显而易见。毋庸置疑，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重要推动力，可以为“在地国际化”积聚更多可资利用的国际资源，如外籍师资、国际性科研项目、国际研讨会等，但也应看到，以充分利用国际教育资源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在地国际化”有着相对独立的实践逻辑，如果没有专门的政策导向，很容易流于自发状态，进而造成对外开放带来的丰富国际教育资源难以被自觉主动地导向国际化人才培养本位。

（二）“在地国际化”的实践探索缺乏平台和制度支撑

“在地国际化”在瑞典的马尔默大学兴起后，就迅速进入欧洲诸多大学的议事日程，甚至成为一些国家教育政策的一部分。这看似一个偶然事件，实际上却与实践探索获得的平台与制度支持密切相关。

1999年，尼尔森在欧洲国际教育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简称EAIE）的一个研讨会上提出“在地国际化”概念后，就提议建立一个特别兴趣小组（Special Interest Group），此建议得到了100多位学者和大学管理者的积极响应[3]。从此以后，该兴趣小组以及此后的专家社群（Expert Community）就成为EAIE推动“在地国际化”的重要力量。EAIE还专门在其官网开辟了专栏，举办年度研讨会，对“在地国际化”进行宣传和推广，并提供各种培训和咨询服务。关于如何开发国际化课程、如何实施在地国际化、如何测量学生的学习结果，荷兰国际教育组织也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流程和策略指南。

2013年，欧盟在当年出台的《世界图景中的欧洲高等教育》（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中将“在地国际化”正式纳入官方文件，从而使得“在地国际化”再次获得发展动能，并由此移向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讨论的中心[7]。2018年，欧洲的“伊拉斯谟+”计划资助的“在地国际化的路径与工具研究”项目开发了在地国际化的自评工具、课程框架和证据框架，其中，自评工具旨在为“在地国际化”的实践提供基准，课程框架为国际化课程体系建设提供参考，证据框架为改善“在地国际化”的成效提供交流的指南[31]。该项目提出的实践工具已经被欧洲国家广为采用。

反观我国，截至目前，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研究文献，却尚无专门的传播渠道和交流平台，官方亦无专门的政策推动，很多实践者对此闻所未闻，亦不知该如何推进，致使现存的国际化资源难以被充分利用。以国内的顶尖高校北京大学为例，其校内的外文资源、国际学生、国际会议等国际化资源不可谓不丰富，然而，文东茅等[32]的调查却表明，北大学生“经常”或“多次”使用外文网络资源和外文教材的比例分别为38.2%和40.1%，“经常”或“多次”选修外教或用外语授课的课程和参加国际会议、报告者的比例都只有14.2%，“经常”或“多次”与国际学生交流的比例只有12.6%。北京大学尚且如此，其他高校可想而知。

（三）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尚面临异质文化获取的障碍

虽然张伟、刘宝存、仲彦鹏等认为我国已经具备了开展“在地国际化”的基础[2,10]，但在跨文化能力培养这一“在地国际化”的关键要素[7]方面，仍面临一定的挑战。

瓦赫克[20]也指出，“在地国际化”的两大支柱（“国际性”和“跨文化”）中，“国际性”相对成熟，“跨文化”则是相对难以实现的一条，因为后者需要异质文化元素的介入。但与欧美作为移民社会的特点不同，我国当前的移民数量较少。“六普”数据显示，在华外国人员只有59.4万人[33]，占我国总人口的0.43%，整体上尚处于文化同质性较强的状态。在校生通过自然的社会交往获取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机会微乎其微，尚需专门的教育介入。

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教育途径中，最理想的是跨境学习，但这样做的成本很高，大大超越了我国绝大多数家庭的承受能力。而且，根据贝恩德（Behrnd）和波

尔策尔特(Porzelt)的提法,10个月以上的境外学习才有助于跨文化能力提高[34],这个时长远远超过我国大多数交换生的域外学习时间。文东茅等[32]对北京大学学生出国情况的调查显示,出国时间在一个月以内的占53.6%,一个月至半年的占39.3%,半年至一年的只有7.1%。

培养跨文化能力的次佳途径是打造多文化校园,但这要以一定比例的国际学生存在为前提。目前留学生在我国高校的分布极不均衡,2019年招收留学生的院校只占当年高等教育机构总数(2956所)的25%,多达75%以上的高校尚无留学生资源可以利用[35]。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面积暴发后,国际学生的招生规模更是受到一定影响。

而且,文化多样性不会自动导致跨文化接触和文化间学习经验[14]。故,仅仅有国际学生在场是没有意义的,这不会必然带来与本土学生的互动。只有通过专门的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设计,才能激发他们的互动行为,从而导向彼此受益的经历。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国际学生实行的是独立管理,有专门的生活区域,本土学生与之交集极少。虽然2018年教育部《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开始提出了中外学生的趋同化管理问题[36],但两个群体的真正融合尚任重道远。

四、推进我国"在地国际化"实践的对策建议

为推进"在地国际化"实践,我国有必要从现有资源基础出发,通过政策引导加强就地利用国际资源的意识和能力,创新与拓展国际化路径。

(一)以政策和评估指标引导战略转型,把国际资源导向国际化人才培养本位

国外的成功经验表明,实施"在地国际化"过程中,通过制定专门的战略规划增强"在地国际化"目标的可见度,可以更好地统一思想,聚焦资源,使评估更有据可依。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偏重跨境流动的宏观政策导向下,"在地国际化"在各层面的战略规划中几乎都是缺位状态。为此,有必要加强"在地国际化"方面的政策布局,引导省市和高校将"在地国际化"纳入战略规划。

同时,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评估指标进行调整,改变当前对留学生数、在学期间赴国(境)外高校访学人数、具有一年以上国(境)外经历的教师比例、国(境)外高校本科生来校访学人数、国(境)外办学机构数、入选来华留学品牌课程数等数量指标的机械关注,加强对国际化人才评价指标的开发及对国际化人才培养覆盖面的考核评估,通过对结果的测量来倒逼国际化内涵变革,引导高校把国际资源的获取导向人才培养本位。

(二)搭建宣传与交流平台,推出中国特色的实践指南和范例汇编

与"跨境流动"只涉及部分师生不同,"在地国际化"的目标群体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全体师生,覆盖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它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专门项目的设立,而是整个办学理念的变革和教育教学模式的改变,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尤其需要教育理念和实施方法的普及和推广。为此,政府有必要(或鼓励高等教育学会等部门)设立相关的宣传和交流平台,加强理念传播和实践指导。

在操作层面,虽然西方国家的探索为我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但也应该看到,"在地国际化"没有标准的模式,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较大。我国在推动"在地国际化"的过程中,有必要结合我国现有的资源基础,对既有经验进行符合我国国情的修正、探索与创新。通过设立专门的研究项目,开发本土特色的实践指南,唤醒实践者的自觉意识,同时让他们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在地国际化"的首倡者尼尔森在反思马尔默大学国际化课程建设经验时还指出,"寻找一些好的典型案例有助于推进实施过程"[3]。美国为了激励大学的"全面国际化"④,每年发布《国际化校园:大学的成功范例》报告,推广校园国际化的典型案例,并设立了"议员保罗·西蒙奖"(Senator Paul Simon)[37],认可高校在全面国际化方面做出的成就及所进行的路径创新。建议我国相关主管部门也在条件成熟时对典型案例进行年度汇编,必要时甚至设立专门的奖项激励高校在地国际化实践的积极性。

(三)创新跨文化能力培养的路径,鼓励跨越国界的"虚拟流动"

针对当前我国"在地国际化"面临的跨文化能力培养的资源障碍,如何开源成为不可回避的选择。在这方面,率先在欧美等国家兴起的虚拟流动(virtual mobility)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它可以让不同国家的学生无须发生空间上的位移,就能通过结构化、互动性较强的视频会议进行合作学习,并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反思、内化跨文化交流带来的经验。《通过虚拟流动促进欧洲教育合作:最佳实践手册》[38]中将虚拟流动界定为: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支持的虚拟环境进行学习的一

种形式，参与者与来自不同背景和文化的异国同伴一起工作与学习，并将增进跨文化理解与知识交流作为主要的目标。

“虚拟流动”虽然听起来是个比较新的概念，却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受到国外关注。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出现了官方资助的研究项目和平台。在欧洲，2006年，欧盟苏格拉底项目的“在流动”课题组研究出版了《通过虚拟流动促进欧洲教育合作：最佳实践手册》。2018年，欧盟又设立了“伊拉斯谟+虚拟交流”计划（ERASMUS+Virtual Exchange）。2015年，美国设立了“斯蒂文斯计划”（Stevens Initiative）[39]，旨在通过发展和加强虚拟交流，让美国、中东和北非的年轻人无须离开自己的社区就可以与国外的同龄人合作和学习，从而获得实质性的国际交流经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成为跨境学习的障碍，使得虚拟流动成为愈加现实的跨文化能力培养形式。疫情期间全球性的在线学习尝试也为其提供了较好的平台与思想基础，但正如“斯蒂文斯计划”特别提醒的，虚拟流动并不是校园关闭期间的短期解决方案，而是每个高校推进面向所有学生的“在地国际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长期重视。

总之，新时期中华民族复兴面临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挑战，我国应充分认识到“在地国际化”的必要性及紧迫性，基于当前的实践基础进行推进的策略设计，使其能够与当前主导的跨境流动模式互相支撑，协同培养具有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国际化人才。

注释

①尼尔森提议建立在地国际化的特殊兴趣小组后，入选指导小组的5位学者于2000年发布了一个意见书（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A Position Paper）。

②常被称为“跨境流动”“跨境学习”“出国学习”等，本文中的跨境流动模式，即对此类国际化行为的归纳。

③我国学者在引入“在地国际化”概念之初，曾将其译为“本土国际化”，后来才以“在地国际化”的译法为主。

④“在地国际化”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有不同的提法，如我国有时也称为“本土国际化”，美国有时称为“校园国际化”，有时候则将其纳入“全面国际化”中。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谋划好“十四五”时期发展十分重要[EB/OL].（2020-07-28）[2021-11-08].http://www.china-cer.com.cn/shisiwuguihua/202007286968.html.

[2]张伟，刘宝存.在地国际化: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走向[J].大学教育科学，2017(3):10-17，120.

[3]CROWTHER P, JORIS M, OTTEN M, et al. Internationalisation at home: a position paper[R]. Amsterdam: EAIE, 2000.

[4]张应强，姜远谋.后疫情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向何处去[J].高等教育研究，2020(12):1-9.

[5]Internationalisation at home in higher education[EB/OL].[2021-11-08]. https://www.nuffic.nl/en/subjects/research/internationalisation-at-home-in-higher-education.

[6]KNIGHT J. Internationalization remodelled: definition, approaches, and rationales[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4, 8(1):5-31.

[7]BEELEN J, JONES E. Europe calling: a new definition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J].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015, 83(special issue):12-13.

[8]SORIA K M, TROISI J.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alternatives to study abroad: implications for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petencies[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4,18(3):261-280.

[9]唐君.基于本土国际化模式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实证研究[J].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17，34(6):79-85.

[10]仲彦鹏.在地国际化:我国高校培养国际化人才的新路向[J].山东高等教育，2019，7(1):35-41

[11]BEELEN J (Ed.). Implementing internationalisation at home: EAI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eries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ors[G]. Vol. 2. Amsterdam: EAIE, 2007.

[12]NILSSON B. Internationalisation at home from a Swedish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Malm?[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3,7(1):27-40.

[13]TEISSIER C.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for IaH: a case study from Mexico[G]// TEEKENS H (Ed.). Internationalisation at home: ideas and ideals. Amsterdam: EAIE, 2007:23-31.

[14]OTTEN M. Intercultural learning and diversity in higher education [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3,7(1):12-26.

[15]TEEKENS H. Internationalisation at home: an introduction[G]// TEEKENS H (Ed.). Internationalisation at home: ideas and ideals. Amsterdam: EAIE, 2007:3-11.

[16]BRUSTEIN W I. The global campu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North America[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07，11(3-4):382-391.

[17]CHILDRESS L K.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university: developing faculty engagement in internationalization[M].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10.

[18]张骏.高校国际化人才本土培养：“一境四同”实践路径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10):8-11.

[19]王洪才，戴娜，江利.本土生国际化: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视角[J].现代大学教育，2014(4):60-66，112-113.

[20]WÄCHTER B.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isation at home in context[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3,7(1): 5-11.

[21]LOU K H, BOSLEY G W. Dynamics of cultural contexts: meta-level

intervention in the study abroad experience[G]// SAVICKI V (Ed.).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transform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erling, Va: Stylus Pub, 2008:276-296.

[22]JONES E, REIFFENRATH T. Internationalisation at home in practice[EB/OL]. [2021-11-12]. https://www. eaie. org/blog/internationalisation-at-home-practice.html.

[23]王璐.高等教育课程国际化的本土追求与设计[J].当代教育科学,2015(7):14-18.

[24]顾明远,滕珺.后疫情时代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挑战与新机遇[J].比较教育研究,2020,42(9):3-7,13.

[25]王英杰.后疫情时代教育国际化三题[J].比较教育研究,2020,42(9):8-13.

[26]蔡永莲.在地国际化:后疫情时代一个亟待深化的研究领域[J].教育发展研究,2021,41(3):29-35.

[27]潘奇."十四五"期间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提质增效与路径创新[J].教育发展研究,2020,40(23):43-49.

[28]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EB/OL].(2021-09-28)[2021-11-12]. 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html/2021-09/29/content_151_5092879.htm.

[29]MESTENHAUSER J A. Building bridges[J]. International Educator, 2003,12(3):6-11.

[30]徐骞.现阶段我国通识教育价值导向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4:6.

[31]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approches and tools [EB/OL]. [2021-11-12]. https://research.ncl.ac.uk/atiah/outputs/.

[32]文东茅,陆骄,王友航.出国学习还是校本国际化?——大学生国际化素质培养的战略选择[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8(1):17-26,188.

[33]在华外国人口若干结构特征[EB/OL]. [2021-11-12]. https://mp.weixin.qq.com/s/wNDlkHEP6pK1__j1Zi-E7w.

[34]廖莉萍.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的实践与思考[J].高教探索,2019(5):63-69,88.

[35]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港澳台办公室).在新时代中奋进 在大变局中前行——"十三五教育对外开放回顾[EB/OL].(2020-12-22)[2021-04-16].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0/52834/sfcl/202012/t20201222_506785.html.

[36]张静.高校国际学生管理趋同化的思考与建议[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1(2):122-127.

[37]Senator Paul Simon Award for Campus Internationalization[EB/OL]. [2021-11-12]. https://www. nafsa. org/about/about-nafsa/senator-paul-simon-award-campus-internationalization.

[38]BIJNENS H, BOUSSEMAERE M, RAJAGOPAL K, et al. European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through Virtual Mobility: a best-practice manual[G]. Heverlee (Belgium): EuroPACE ivzw, 2006.

[39]2022 Virtual Exchange Impact and Learning Report[EB/OL]. [2021-11-12]. https://www.stevensinitiative.org/resources/.

收稿日期:2021-07-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21年度教育学一般项目"后疫情时代以'在地国际化'加速我国国际化人才培养研究"(BIA210182)

作者简介:房欲飞,1977年生,女,山东聊城人,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管理和大学生研究。